



ISBN 7-5383-1715-5

K·60 定价：4.00元

东北抗联丛书

我在抗日
联军十年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东北抗联丛书

我在抗日联军十年

彭施鲁

责任编辑：任毅馥

封面设计：曲 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3插页200,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数：1—500册

定价：4.00元

印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ISBN 7-5383-1715-5/K·60



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一部分军官合影。
第二排右起第一人为彭施鲁同志。

自序

我想通过这本回忆录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一些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生活中的情况。

1935年的12月，当我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之后，即按照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动身去东北。预定到黑龙江省方正县找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李延禄的队伍。走前，组织上告诉我，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颇为乐观，迫切需要吸收一些革命青年学生参加那里的工作。我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动身了。还好，组织上派出了一位富有社会经验的交通员带路，我们化装为卖艺者师徒三人，比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当我第一天走进设在林海雪原深处的部队密营时，看到了那么多的满怀革命激情的干部和战士，我的情绪被深深感染了。我认为：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很有希望的。

当时的抗日联军处于发展的初期。1936年至1937年当中，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形势颇为喜人。但是到了1938年春天，出现了转折。日本人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军事上的长期围剿，配合着归屯并户政策，迫使抗日联军在与人民群众隔绝，缺少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应战。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我们的一些抗日同盟队伍动摇了，一部分溃散，一部

分投降日寇了。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有些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为了打破敌人“聚而歼之”计划，抗日联军按原定计划突出重围，分别离开老游击区，实行西征。但是西征途中受到严重的损失。只有李兆麟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而且站稳了脚跟。而杨靖宇将军和周保中将军所指挥的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则被迫重新返回老游击区，尽管那里的形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到了1938年底，整个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从1937年的3万余人锐减至5千人左右。

正是在这样的严重时刻，东北的党组织又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得不到党中央的任何指示和支持。原来也曾希望苏联给予某种形式的支持，但是在1938年至1939年之内，并未争取到。因之，处在困境中的抗日联军只能在夏秋两个季节里恢复主动局面，而且还可以打一些胜仗。但是，在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季里，我们又一直处在日伪军的追赶围歼之中。因之到1940年底抗日联军的总人数已不足一千人了。多亏在1940年春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有了一点进展，因之在1940年冬季被迫陆续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游击队员都受到了良好的安排，并从此转入长期整训工作。

周保中和冯仲云两位领导同志经过多次的努力，终于在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搭起了一座双方互相支持与合作的桥梁。在增进与巩固双方关系方面，周保中的工作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他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使我们既争取到了必需的支持，又不受制于人。在他的坚持下，东北的中共组织虽说是有些也被迫转移至苏联境内，但始终保持着自己

的独立性，也保持着党对这一支抗日队伍的领导权。这些组织原则上的重要性，直到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之时，我们仍然能以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返回东北境内参加战斗之时，才更加认识清楚。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的整训，以及在1945年8月与苏军的协同作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中颇有特殊意义。它也必然的要在中苏两国和两支军队的关系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因之，通过我的回忆使读者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是有必要的。

在抗日联军中有若干支队伍是中国和朝鲜的战士们合编在一起的。也有许多极为优秀的朝鲜干部和战士光荣地献身于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我至今还能对其中许多同志的音容笑貌清晰地回忆起来。还有一些杰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我那时的上级，其中有的已在美军侵朝战争时壮烈牺牲。我也想借这个篇幅来表达对他们无限怀念之情。一支中朝人民共同组成的抗日队伍的国际意义，也是值得一书的。

彭施鲁

1989年5月

目 录

一	把我和东北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老师·····	1
二	李常青机智脱险·····	20
三	在北平和塘沽·····	41
四	在进入东北境内的沿途中·····	59
五	在第四军的密营里·····	82
六	对第四军的初步印象·····	87
七	对我们的人伍教育·····	97
八	我给李延禄当秘书·····	102
九	李延平出师不利·····	112
十	第四军去宝清县开辟新游击区·····	125
十一	1937年三江地区的形势·····	138
十二	1937年内第四军的几件事情·····	152
十三	危机四伏·····	167
十四	我在下江留守处·····	176
十五	留守处几次遭到敌人袭击·····	185
十六	留守处人员八个月中的思想变化·····	192
十七	由宝清到饶河·····	204
十八	我到第七军工作·····	212
十九	向抚远县进军·····	225

二十	严峻的冬天·····	243
二十一	1940年的斗争·····	254
二十二	两次伯力会议·····	268
二十三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280
二十四	有关政策问题的回顾·····	300

一 把我和东北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老师

1946年5月，合江省政府（当时设在佳木斯市）主席李延禄同志告诉我说：“李常青来到了佳木斯，打算在此筹建东北日报社。”他看我好象不知道李常青这个名字，又赶快说：“他不是你的老师吗？原来叫李耀光吧！”我说：“是吗？那太好了！我太想念他了！”之后，我就赶快跑到李常青住的招待所。

一晃十年多了。1935年的12月，也就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几天里，是李常青同志派我到东北抗日联军里工作的。我到了东北之后，曾往北平写过几次信，想通过我的同学王琪将我的情况转告我的好友加同志余士珍、王静敏，并且可以通过他们告知老师李常青。但是游击队的流动性太大，我无法安排通信地址。而在北平，也只有王琪同志有个固定的通信地址，但在“七·七”抗战之后，他也逃离了北平。我回想起来只收到过余士珍的一封回信，以后就完全断绝了消息。

到了1945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北，和东北抗日联军汇合，延安也派来了大批党政干部。我就到处打听我的几个好友和老师。最先从李延禄同志那里

知道了李常青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过，其他人还一时打听不到。现在突然得知李常青老师就在身边，真是别提多高兴了。

当见到李常青时，同时见到了他的爱人范自修。记得1934年在河南焦作上中学时曾看见过范自修同志，我和余士珍到李老师家里去过几次，那时她从不参予我们和老师之间的谈话，这可能是李老师所规定的一条组织纪律吧。而实际上范自修对我们却很亲热，招待我们的茶水是加了糖的山楂水，很好喝。那时，他们还有一个9岁的男孩，叫范政。隔了十多年之后，范自修再见到我简直象个老妈妈见了多年不见的孩子似的，话多的不得了。我那次去没有看见范政，只看见了范政的妹妹李万青，当时才5岁，长的模样和在焦作时的范政一个样。一问，才知道范政在辽东工作。我对李常青谈了我到东北工作十多年来的主要情况，又向他打听余士珍、王静敏和王琪等人的情况。得知王静敏在新四军；余士珍曾在山东工作过，以后牺牲了；王琪在华北工作。由于日本投降之后，形势变化很大，一时还弄不清王静敏和王琪的所在单位。

到了1947年的秋天，我在佳木斯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王琪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哈尔滨工作，在松江省财政厅任处长，他是从李常青那里得知我在佳木斯的军政大学分校工作的。信中除说王静敏在华东野战军工作外，还说高向明在新华社总社工作。高向明是焦作中学女生部的学生，和余士珍是好友。1935年我和余士珍一同住在北平鼓楼集贤公寓时，余士珍经常把他俩之间的来往通信给我看，我了解到他

们之间不只是恋爱关系，更多的是革命的友情。我捧着他的信，高兴得直流眼泪。

在河南省焦作市焦作中学高中部时，王静敏、王琪、余士珍和我同班。1934年的春天，李常青担任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们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那时李常青是中国共产党焦作中心县委书记。那年夏季，王静敏和王琪转到北平上学，我和余士珍同时由李常青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焦作市党团组织遭到破坏，李常青逃脱了敌人的搜捕，转到北平，参加了河北省的工作。我和余士珍也根据李常青的指示离开焦作市转到北平上学，重新和王静敏、王琪见面，我们之间的往来逐渐密切。王静敏和王琪在1935年之内也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49年，当长江以北已经全部变成解放区的时候，我给第三野战军组织部写信询问王静敏的工作单位。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王静敏的回信，知道他在二十一军任副政委，从此恢复了联系。

1951年，我又在沈阳碰见了焦作中学的老同学张鸿纲。他当时是作为北京派出的工作组成员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参加“三反”运动。他已改名为张璋。谈话之间，他说当时他在李常青的教育影响下，已产生了强烈追求真理的欲望，但可惜的是焦作市的党团组织突然遭到破坏，李常青也被迫逃离，自己一时无法找到参加革命的门路。“七·七”抗战之后才入了党。

1952年4月，我随代表团去朝鲜访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志愿军司令部和华新社分社通了个电话，找到了高向明。她很

快地跑到招待所来看我。我们又畅谈了焦作中学时代的情景，并且为余士珍的牺牲深感惋惜。高向明同志失去了这样一个深深地爱着她的人，是非常不幸的。

在这以后，我们几个焦作中学的老同学经常以朋友加同志的关系相会，畅谈往事，往往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向李常青。谈得较多的是他的马列主义宣传艺术和他从敌人手中的机智脱逃。共同的感触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走上革命道路都是李常青指引的结果。应该说他是我们在黑暗的旧社会中获得新生的恩人。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认识李老师开始的。

1934年春季，河南省焦作市的焦作中学来了一位语文（当时叫国文）老师，名叫李常青（他当时用的名字是李耀光），此人当时有30岁左右，中等身材偏低，稍微有些瘦，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讲一口东北话，他和原先的语文老师很不相同。在他之前的那位语文老师叫薛幼卿，是专讲古典文学的。李常青则是讲现代文学的，他的口才很好，一开始上课就引起了我们高中二年级学生们很大的兴趣。以后又逐步发现，两位语文老师之间的差别远远不止这一点。

同班的学生们不只水平不整齐，学习态度也各异，还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在我们下一班高一的同学中，有一个赵启明，很爱恶作剧。前几天他就向英语老师开了个玩笑。英语老师张文伦正患痔疮，有个好心的学生专门在讲台上放了一把椅子，请老师坐着讲课。赵启明拿了一个红薯，在上课之前十来分钟走进教室，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把红薯的一头削去一截，然后向其他的同学们做了个鬼脸，就把红薯竖着

放在老师的椅子上。有的同学说他净干缺德事。他回敬了一声：“你少管闲事！”接着，张老师走进了教室。同学们起立。老师说了声：“*Sit down please!*”（请坐）在同学们坐下的同时，有人发出了嘿嘿的笑声；有的人用眼睛瞪了赵启明一下；有的则注视着张老师会不会一屁股坐在红薯上。英语老师和往常一样，拿起学生的名册，一一点名。就在这点名的一分钟之内，他看出了同学们都以各种不同的目光观察着他和赵启明，而赵启明则一本正经地端坐着，象个木头人。点完名之后，张老师从椅子上拿起了红薯，举在空中，向同学们发问：“*what is this?*”（这是谁的？）同学们都笑了，却没有人回答。张老师也稍微笑了一下：“*Mr. 赵启明, 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赵启明为了礼貌，不得不站起来，但没有张嘴，弄得面红耳赤。以后张老师自己回答了：“*This is potato,*”（这是红薯，接着又说：“*Mr. 赵启明，请你跟着我说一遍：‘This is potato.’*”赵启明这时越发地难堪了，胡乱地跟着老师重复了一遍上述的话。“*Sit down!*”张老师这句听起来很严厉的命令语，却使赵启明如释重负。“好！现在我开始讲第五课。”张老师巧妙地结束了这件事。

又过了几天，在上语文课之前，黑板上出现了“亡国奴”三个字。同学们立即意识到是谁又在搞恶作剧了。但这不是一般地开玩笑，是政治性的侮辱了。有的同学想去从黑板上擦掉这几个字，但已经来不及了，李常青老师已经走进课堂了。同学们看到了李老师以不寻常的目光注视到黑板上的三个字。但他很快地恢复了平静，暂时没有理睬它，照常翻开了讲义，开始讲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他说，在前课中已经讲

过了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从中提出人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最好是再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篇短文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的一个侧面，而长篇的著作就应该选择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为内容，写出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并能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这样的作品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呢？这样的问题可以举出若干个！譬如说，我国4万万同胞绝大多数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受着压迫，受着剥削，中国应该找到一条道路，使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不再遭受压迫和剥削，摆脱贫困。青年们有责任为创造一个新的合理的贫富并不悬殊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再如，当前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侵占了我们东北的大片土地，现在又在阴谋攫取华北，并进而并吞全中国。我们堂堂的中华民族谁人甘愿接受异民族的统治呢？现在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他这时才回过头来看着黑板上的3个字，接着又说：“那么，是东北同胞甘愿做奴隶吗？绝不是！东北人民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是和反抗外国入侵，争取生存自由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曾有30万军队负责保卫国土，但是当日本侵略者只以不足两万人的军队发动侵占沈阳的事变时，我们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要东北军撤退到山海关以南，从而拱手将东北的大好河山奉送给了日本强盗。在不到半年时间，北至黑龙江，南至长白山，全部沦陷在敌人手中。这时，肩负起抗日重任的只是由东北各地的爱国军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为了维护自己

的民族尊严而浴血奋战并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只有爱国的群众团体表示过声援。抗日义勇军在缺少强有力的援助之下遭到了失败。东北的丧失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是东北人民自己的责任吗？不是的。我是在东北沦亡之后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我直到现在还是认为自己的家乡是可爱的。我的家在吉林省延吉县，那里土地肥沃，盛产水稻和黄豆，地广人稀，农民很容易得到一块耕地，生活问题不难解决。但是现在人民群众却遭受着日本强盗的掠夺。日本兵烧房子、杀人、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同学们，面对东北沦亡的现实，你对东北同胞是表示无限的同情呢？还是把他们当作丧家之犬来加以嘲笑呢？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东北同胞，而你在和这位同胞谈话之后，要写一篇感想的话，你将写出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同学们，文学的特点就是这样。每篇文章，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对当前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你总是会有个态度的，你同情谁？歌颂谁？仇恨谁？鄙视谁？总是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

李老师的一番话，引起了每个学生的深思，赵启明把两只胳膊支撑在课桌上，两手放在眼和眉毛之上，极力不看任何人……下课之后，同学们纷纷责怪赵启明的无知，说他给同学们丢人。赵启明悔恨得无地自容。

在我们高二班里，听了李常青的几次语文课之后都觉得内容新颖很受启发。一次，他选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敬业与乐业》讲给大家听。那时，在学生的心目中，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但是，李老师在讲完这一篇文章

之后，告知学生对任何人的文章都不要囫囵吞枣。他说枣肉当然是好吃的，但是你连枣核都吃下去，不光得不到营养，还会刮破了肠子。也就是说对任何一篇文章，不要笼统地接受它，要有自己的分析。要自己想一想，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摒弃。他说，就拿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这篇文章来说，先讲的是每个人要敬重自己的职业，要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同时要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爱好自己的行业。李老师说，但是梁先生并不懂得职业是有贵贱之分，有些人是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有些人则是为生活所迫，为了养活妻儿老小，拼命地干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工作场所是臭的脏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有如掏粪的工人。如果让你梁启超先生去掏大粪去，我想他是不会大谈什么敬业和乐业的。他又进一步讲：因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处在剥削人压迫人地位的人，和处在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人，两者对同样一事物是不会抱有完全相同观点的。这在哲学思想上讲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人，由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对同一事物的是非观念也会是不同的。他说，他还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他坐在火车上，听见周围的几个旅客热烈地议论着刚刚走过去的一个女人，以她的奇装异服为话题，谈得非常热闹。但是坐在附近的一个彪形大汉什么话也没有说。有人征求他对这位身着奇装异服者的意见，他说他不曾注意到她的服装，只看到她的脖子长得长了一些。在和他聊天当中才知道他的职业是刽子手。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对那位女人的奇装异服好象根本没有看见，而只是看见了她的脖子。因为这是他职业上的需要，